

冷战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

葛汉文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部分学者围绕“欧亚主义”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分析这两大思想传统的现实价值及其启示,力图藉此理解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身份、国家地位与未来命运。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兴起,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实践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看来,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依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延续,基本没有克服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存在的诸多缺陷。个别激进的地缘政治观点与沙文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联系较为紧密。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俄罗斯 地缘政治思想 冷战后

在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自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和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时候起,俄罗斯帝国及后来的苏联便以其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独特的位置及较西方社会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始终吸引着地缘政治研究者的注意,对俄帝国(及后来的苏联)地缘政治形态及其影响的描述、假设与推断几乎占据了现代地缘政治思想文本的主要篇幅;另一方面,除20世纪20、30年代以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王子(Prince Nikolai S. Trubetzkoy)、彼得·萨维茨基(Petr N. Savitsky)等

* 葛汉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讲师。(邮编:210039)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后世界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国际政治意义研究”成果组成部分(立项批准号为12CGJ022)。

人为代表的个别俄国流亡者曾出版过一些多少涉及地缘政治的著述外,^①俄罗斯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术传统。特别是在苏联时期,由于地缘政治一直被官方痛斥为一种“伪科学”和一种为垄断资产阶级发明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侵略谬论,因此,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汉(Alfred T. Mahan)的两部著作曾被翻译成俄语出版外,苏联学者大多对地缘政治理论不甚了解或知之不深,“地缘政治”成为了苏联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②应当承认,很多苏联时期的军事家、外交家和学者在展开某些战略问题研究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地缘政治的某些视角和方法,^③但他们大多对“地缘政治”一词保持一定的警惕,拒绝将自己的研究归于此类。

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这种局面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地缘政治研究在很短时间内就渗透到俄罗斯联邦政治、军事、外交与教育等各个领域。地缘政治成为一门大学课程,相关的著作、教材与研究机构大量出现;地缘政治研究得到了俄军方的重视,俄军事机构、很多军方杂志和军事院校的教学大纲都将其置于突出的位置。尽管在概念与表述方面存在分歧,但当代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接受了这一术语,“地缘政治已经成为横跨俄罗斯国内政治光谱的一门显学”。^④经过20年的发展,地缘政治理论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俄罗斯人思考自我历史身份、民族认同、政治局势、国家命运和全球地位的基本视角之一。

一、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两种思想传统紧密相关。一是“欧亚主义”(Evrasiistvo)传统,它是20世纪20、30年代一些为躲避俄国革命而逃至布拉格、柏林与巴黎等地的俄国移民创立的一种文化—哲学思潮。主要以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等人为代表。这种思想力图为苏维埃革命后的俄罗斯寻求一种新的文化视角,以拒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堕落的”西方文明在俄罗斯的广泛

① 有关俄罗斯早期地缘政治思想的介绍,可参见杨勇:《俄国“白银时代”俄侨知识分子的地缘政治思想》,《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第70—75页;陈训明:《萨维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第79—82页。

② Vladimir Kolosov and Rostislav Turovsky, “Russian Geopolitics at the Fin-de-siecle,” in Andrew H. Dawson and Rick Fawn, eds.,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Ea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3, p. 143.

③ 苏联学者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论述,尤以海军元帅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Sergey Georgiyevich Gorshkov)在海军建设及其对国际政治影响等方面的论述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此方面较为全面的论述可参见 Sergei Chernayavskii, “The Era of Gorshkov: Triumph and Contradiction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2, 2005, pp. 281-308.

④ Natalia Morozova, “Geopolitics, Eurasianism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Putin,” *Geopolitics*, Vol. 14, No. 4, 2009, p. 669.

“蔓延”,重塑俄民众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俄罗斯广阔的领土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撞击点和结合部,历史上各个族群与文明在这里相互竞争、冲突与交融,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且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俄帝国在四个多世纪时间里向东方的扩张,将一大批非俄罗斯人纳入这一命运共同体当中,因此,俄罗斯不仅带有诺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欧洲成份,也传承了拜占庭和鞑靼人的东方基因,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特性。因此,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文明亦不属于东方文明。它是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显示了俄罗斯在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完整统一”。^①

在欧亚主义者眼中,西方是俄罗斯欧亚文明的天生大敌。值得注意的是,欧亚主义言中的“西方”在地理上实际涵盖了俄罗斯以西的任何国家,包括波兰、立陶宛、瑞典。在他们看来,“对东方发起猛攻”在历史上实际是整个欧洲的总口号。从条顿骑士团、约翰三世的瑞典、拿破仑、波兰白军到纳粹德国,西方经常性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已成为俄罗斯历史演进中格外痛苦的一部分。西方对俄罗斯的威胁不仅来自军事层面,更是文化层面的,其实质是两种文明(即“罗马—日耳曼”文明与“希腊—斯拉夫”文明)千年敌对的历史延续。彼得大帝通过欧化改革从而使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尝试,实质上给俄罗斯独特的欧亚文明带来深重灾难:“(俄帝国)表面上的强大是以付出欧洲对俄罗斯全方位的文化和精神奴役为代价的”,它破坏了俄民族的统一与历史文化的传承,广泛挑起了俄帝国各阶层、等级和宗族之间的纷争,其结果则造就了一个“畸形的俄罗斯”。苏维埃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彼得大帝欧化政策“更大规模和更热情的继承者”,从而使俄罗斯更加难以摆脱欧洲文明的桎梏。^②

与对西方文明的极端敌视不同,欧亚主义认为亚洲文明对俄罗斯更具亲和力,因为亚洲文明与俄罗斯欧亚文明实际上拥有“共同的起源”。萨维茨基就将罗斯被迫臣服金帐汗国的历史视为罗斯防御西方文明威胁所采取的一项必要措施,甚至是一种与蒙古人的攻守同盟,因为那一年正好是罗马教皇宣布发动“反对分裂派教徒(即东正教教徒)与鞑靼人”的十字军东征的年头,而当年拒绝与金帐汗国结盟的白罗斯、基辅、加里西亚最终都成了西方(立陶宛与波兰)兵锋的牺牲品。因此,罗斯表面上的屈从实际上最终保护了自己精神的自由和独立,不再受侵略成性的日耳曼世界的威胁。^③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蒙古等亚洲文明的历史被成功嫁

① Mrak Bass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1, No. 4, 1997, p. 565.

② [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于宝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③ Marlène Laruelle,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Eurasianism: An Imperial Vers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2, No. 1, 2004, p. 116.

接到俄罗斯的历史演进当中,俄罗斯也因此被认定为一种具有独特历史与文化认同、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

欧亚主义绝非仅仅是一种文化—哲学思潮,它还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色彩。在欧亚主义者看来,欧亚大陆不仅划分为欧、亚两个大洲,而且由欧洲、亚洲与“欧亚”(或“欧亚—俄罗斯”)三个部分组成。欧亚主义者眼中的欧洲是位于俄西部边界之外的一个半岛及其附属的岛屿,亚洲仅包括中东、伊朗、印度和中国等西亚、南亚和东亚国家,欧亚大陆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都属于“欧亚世界”。这里位于欧亚大陆的关键位置,它所拥有的特殊完整的地理形态(如辽阔的疆域与大致平坦的地形地貌)与近乎封闭的自然环境(如出海口之缺乏、大陆特征及交通上相对隔绝),在为俄罗斯民族提供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决定了俄罗斯所独有的民族性与国家角色。总之,俄罗斯在文化与地理上不同于欧洲与亚洲的“第三洲”特征,使其必然拥有一条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特殊道路”。^①

影响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另一大理论传统,是以麦金德、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等人为代表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麦金德及其著名的“心脏地带”理论,对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影响颇深。作为现代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者,麦金德在其1904年的著名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将欧亚大陆的中心和北方区域视为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这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与外界相对封闭,没有通向适宜航海水域的通道,有利于陆地机动性的发挥。在历史上,严苛的自然环境致使这里只能维持稀少的人口,向来就是军国主义的统治地与强权专制的栖息地,只能凭借某种形式的独裁或专制统治方整合为一体。随着海权优势时代(即所谓“哥伦布时代”)的行将结束和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愈发密集的铁路网与快速普及的工业化,在使这一区域更为紧密地聚合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其机动性的大幅增强。其后果是对海权世界构成日益严重的压力,并终将发展成为“对世界自由的严重威胁”。^②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引起了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的极大兴趣。尽管麦金德的出发点建立在巩固英帝国全球利益与维系霸权基础上,其政策建议目的在于如何阻挠和破坏“心脏地带”的权势潜力,^③但麦金德宏大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俄罗斯民族气质、资源领土所具备的庞大权势潜力的认识,仍被当代很多俄罗斯学者所赞赏,并认为这正是他远远高于历史上大多数战略家的地方。俄当代地

① Marlène Laruelle,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Eurasianism: An Imperial Vers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p. 117.

②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2004, p. 342.

③ Klaus Dodds and James D. Sidaway, "Halford Mackinder and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A Centennial Retrospectiv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2004, p. 292.

缘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将麦金德视为“在解释世界政治历史方面最大胆和最具革命性的学者”,将其《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视为“解释世界历史规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文本”。^① 在这些学者的鼓吹下,麦金德的著述在一些重要杂志上反复被引用刊载,当代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论述都或多或少地与其理论有所关联。^② 尽管这些学者对麦金德理论的理解存在一些差异,但都对“心脏地带”在世界历史中具有的重要意义持肯定态度。在俄罗斯实力大幅衰减、国际地位不断下降、政治经济迅速恶化的局面下,麦金德在一个世纪之前的预测与断言,使很多俄罗斯人“开始相信他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俄罗斯恢复伟大地位的希望正寄托在这个理论上”。^③

另外,经典地缘政治的另一大理论传统——“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也得到了俄罗斯当代学者的充分注意。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地缘政治学”一直被苏联学者谴责为一种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及纳粹德国疯狂侵略政策的帮凶,但以“德国地缘政治学”领军人物豪斯霍弗的著作 2002 年在俄罗斯首次出版为标志,“德国地缘政治学”重新引起了当代俄罗斯学者的兴趣。豪斯霍弗提出的“有机体”(Organismus)、“空间征服”(Raumüberwindene)、“生存空间”(Lebensraum)、“大空间”(Grossraum)等概念,经过俄部分学者与政治家的解读与论证,开始在俄罗斯当代公共政策和学术辩论中被引用与讨论。^④ 这部分学者希望通过对上述观点的考察,发掘对俄当前地缘政治形态与未来战略规划可能具有的启示与意义。

除直接受益于上述两种思想传统外,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还多少掺杂了其他许多政治与社会理论,如共产主义理论、东正教教义、原教旨民族主义等等。在部分俄地缘政治者那里,这些看似彼此矛盾的政治与社会学理论都被吸纳与调和,地缘政治也因而成为了一把“哲学的大伞”,吸收了后苏联时代俄社会中先后涌现的很多激进的政治思想。^⑤ 因此,一些学者将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集合体并非全无道理,这可能也正是它能够同时被俄左右翼政治势力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

①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Vol. 11, No. 1, 2006, p. 106.

② William C. Wohlforth, "Heartland Dreams: Russian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Wolfgang F. Danspeckgruber, ed., *Perspective on the Russian State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LISD, 2006, p. 265.

③ Charles Clover,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1999, p. 9.

④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01.

⑤ Charles Clover,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p. 9.

二、保卫心脏地带:防御的欧亚主义

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最为鲜明的特色,在于其集中围绕欧亚主义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叙事风格。但是,俄罗斯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界对于上述两大思想传统的认识实际上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在部分俄罗斯学者看来,欧亚主义传统中的“欧亚”概念与麦金德“心脏地带”概念在地理范围上是大致等同的,两者都明确定义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属性。在这种观点最为著名的拥护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ii Ziuganov)看来,在过去几百年间,辽阔的疆域在为俄罗斯独特的文明形态提供地理空间基础的同时,也界定了其历久不变的地缘政治身份。这一地带在地理上由辽阔的内陆空间构成,具有向内的凝聚力,但它与海洋之间的联系却几乎完全被切断,这正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基本特征。麦金德将该地带赋予“心脏地带”的称谓,是对其重要的地理与历史地位的承认。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只有一次越过太平洋在阿拉斯加半岛建立了统治,但最终失去这个殖民地并从北美迅速后退。这实际上为其大陆特性提供了一种历史反证。^①与麦金德对这个大陆堡垒“交通不便、不易受到攻击”的描述相比,久加诺夫从逆向的视角出发,将“心脏地带”视为一个在防御上相对有利、内部高度整合、自给自足的政治地理区域。

在全球地缘政治层面上,这些学者赞同麦金德关于世界历史中陆权与海权不可调和、永恒对立的观点,也认可欧亚主义者将西方作为俄罗斯头号敌人的论断。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的全球地位与应有战略,归根结底取决于“陆权—海权对立”这一基本的地缘政治事实,这是不受历史或政治因素变化影响的,无论“俄罗斯是独裁主义、共产主义或如今天一样——虚假民主的”。^②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正是基于这种事实不断地封锁与围堵“心脏地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在中东欧地区制造一系列新民族国家的做法,完全是西方试图构筑起一条“带状防疫线”,以阻止苏联与德国“大陆集团”的贯通并对“心脏地带”实施直接威胁;冷战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政策同样出于围堵“心脏地带”的需要,而非单纯地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反对苏联;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依然建立在这一“地缘政治事实”的基础上:不论俄罗斯如何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加快西方式民主步伐并主动消除对西方的军事威胁,但仅仅是由于地缘政治原因,西方

^①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03.

^②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03.

社会在思想深处长久隐藏的“恐俄症”(Russophobia)注定将延续。^①一个世纪前“麦金德的基本诉求就是清除俄罗斯对‘心脏地带’的控制,这与俄罗斯今天的‘死对头’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的理念完全一致。……冷战结束后北约完全是在按照麦金德的方式,力图建立起对东欧的控制,以便控制‘心脏地带’”。^②

这部分学者据此指出,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应有战略及其历史命运也是由这个基本的地缘政治事实所定义的。基于“心脏地带”是一个在地缘政治上自我整合、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具有独特文明形态的地理历史区域,因此,冷战时期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扩大影响、与美国进行全球权势争夺的战略显然是错误的:“苏联的这种‘海市蜃楼’般的举动在分散了其力量同时,也丧失了对‘鼻子底下’的政治进程的必要的控制能力,这正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因素。”^③因此,当代俄罗斯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应当在承认“心脏地带”有机统一特征的前提下,通过积极加强俄罗斯与“心脏地带”其他部分(即前苏联已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联系,积极应对西方文明的压迫与威胁,最终恢复“心脏地带”在政治上的统一,使俄罗斯能够在精神与物质资源上得到健康重生。

在文化层面上,这部分学者力图吸取欧亚主义的精神内核,从而为当代俄罗斯的民族身份定位与重塑国家认同提供帮助。他们拒绝将欧亚主义简单等同于俄罗斯民族主义,如久加诺夫将欧亚主义中有关“欧亚文明共同体”的论述与列宁的民族友好原则相结合,以期在理论上将“心脏地带”内的所有族群都整合为一个拥有共同“欧亚”历史、彼此命运相联的文明整体。在他看来,纯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符合俄罗斯联邦的民族、文化与社会现状,完全无助于在鞑靼斯坦与高加索等地区创造国家政治认同。久加诺夫拒绝将自己视为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自称为“巴什基尔民族主义者、鞑靼民族主义者、卡尔梅克喇嘛教的坚定保护者”。^④这种相对宽泛的民族主义观点,正是久加诺夫1996年总统竞选时在俄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轻松取胜的原因,这与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等人较为狭隘、排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久加诺夫等人的地缘政治主张,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独立伊始外交政策的一种理论回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基本考虑是主张全面加入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仿效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争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从而摆脱国内危机,实现经济繁荣与振兴。这一政策还被视为是一种

① Charles Clover,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p. 12.

②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04.

③ Ibid., p. 105.

④ Charles Clover,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p. 12.

“回归文明”之举,俄罗斯力图再次成为一个“欧洲的学徒”,重新开始其在17世纪中后期由彼得大帝开始的、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已经中断的“西方化传统”。^① 不仅如此,重返西方还被认为预示了一个崭新的地缘政治的开始,俄罗斯将永远放弃重建帝国的野心,告别帝国主义的过去,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的俄罗斯民族国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俄罗斯在独立之初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机制、力争成为西方国家平等的合作伙伴、与北约合作并分享安全机制,并在削减战略核武器、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制裁伊拉克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向西方做出重大政策让步。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甚至对部分独联体国家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相互关系普遍有所恶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向西方的一边倒政策,却事与愿违:不仅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可望不可及,国内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也陷入重重危机,而且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俄罗斯亦常常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排除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决策之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利用俄国力衰弱之时大举向其周边渗透,挤压俄战略空间,对俄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在此背景下,久加诺夫等人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思考,体现出当代俄罗斯部分左翼人士对于俄独立伊始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的强烈不满,以及他们对苏联解体及由此导致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骤然下滑的极大痛惜。他们力图通过地缘政治的解释,重新唤起俄罗斯民众对苏联时代的“美好记忆”和对俄罗斯发展潜力与光明未来的信心。另外,久加诺夫等人将欧亚主义与列宁民族观点相联系的做法,还体现出俄左翼政治力量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巨大冲击、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内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力图将部分新观点、新思路引入传统意识形态,使后者重获活力从而争取更多公众支持的考虑。他们所鼓吹的诸多观点,如西方与俄罗斯经久敌对、俄理当主导“心脏地带”的整合过程、捍卫“欧亚”不受西方入侵等,表达出很多俄罗斯普通民众由于国力下降、民生凋敝加之对西方希望幻灭所导致的深刻的挫败感,以及由此激发出的要求恢复苏联时代强盛国威、捍卫在原苏联边界内影响、恢复在欧亚大陆传统地位的呼声。

三、拓展心脏地带:进攻的欧亚主义

冷战后俄罗斯流行的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地缘政治观点,主要体现在以杜金、弗拉基米尔·日里基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y)等人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的相关论述当中。

^① Graham Smith, "The Masks of Proteus: Russia, Geopolitical Shift and the New Eurasianism," *Transactions of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24, No. 4, 1999, p. 482.

同久加诺夫等人类似,麦金德在全球地缘政治层面上有关海陆权永恒对立的观点得到了这些学者的热情拥护。杜金将陆上文明与海上文明视为世界文明的两种最主要的类型,认为两者具有独特的经济增长与国家建构方式,并且通常处于一种长久延续的洲际战争当中。杜金用“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对抗来替换麦金德陆权与海权的对抗,并将这种对抗认定为全球历史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政治断层线。在他看来,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必然导致它在经济与政治模式上与西方之间存在永久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而非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是西方社会对俄罗斯怀抱持久敌意的真正来源。^①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其实质是西方不惜一切代价最大程度削弱“心脏地带”政策的当代延续。^②

如麦金德当年提出“海权—陆权”两分法解释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规律一样,杜金也引入了一系列两分法(如“基督教—东正教”、“西方—东方”、“民主—威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变动为特征的社会—以延续性为特征的社会”等等)来描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宗教、地理、政治与社会等各个层面上的恒久差别。在杜金等人看来,这些差异性正是俄罗斯与西方延续几个世纪的冲突的根源。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这种对抗——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却依然以不同形式继续着,而对此忽视(如俄罗斯独立之初的对外政策)则是违背历史规则的,是对俄历史与文化的彻底否认,也有悖于俄罗斯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这部分学者的思想与久加诺夫等人的观点和结论大致相似。

杜金等人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思考,还受拉采尔、豪斯霍弗、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及施密特等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拉采尔、豪斯霍弗、施密特等人有关“大空间”与“空间征服”的观点极大影响了杜金对于俄罗斯未来战略的思考。在他看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大陆强权同样处于不断寻求“大空间”的斗争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的命运不能与欧亚大陆的命运相脱离,相反,两者在地缘政治上是共生共存的。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单独的、紧密联接的地缘政治单元,也是一个具有庞大潜在力量的地域,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位置使其成为欧亚大陆的组织中心,它必须也有能力独自动员整个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融合进程,从而再次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这是俄罗斯被注定了的命运”。^③

① Vladimir Kolossov and Rostislav Turovsky, "Russian Geopolitics at the Fin-de-siecle," in Andrew H. Dawson and Rick Fawn, eds.,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Eastern Europe*, p. 145.

②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07.

③ Graham Smith, "The Masks of Proteus: Russian, Geopolitical Shift and the New Eurasian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24, No. 4, 1999, p. 484.

而那些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权势力量(即麦金德言中的“内新月型地带”或斯皮克曼言中的“边缘地带”)将与俄罗斯产生“充满活力”的地缘政治互动,结果必使其与俄罗斯建立起同盟或依附关系,保持地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在杜金看来,欧洲(特别是德国)与俄罗斯存在战略妥协的可能性,前者最终成为俄罗斯主导下的欧亚大陆体系下的一个同盟者。日本是俄罗斯在东方的天然同盟,伊朗是俄在欧亚大陆南方的同盟。随着这一进程不断发展,最终将出现一个四边形的大陆国家同盟体系(即“柏林—莫斯科—东京—德黑兰轴心”),将西方与海权国家的影响完全逐出欧亚大陆。^① 杜金这种关于建立欧亚大陆同盟从而驱逐海权国家影响的观点,与豪斯霍弗近80年前提出的观点存在惊人的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将这个联盟的主导国家从德国换成了俄罗斯。

从严格意义上讲,杜金等人的观点与传统的欧亚主义存在显著区别。后者将“欧亚”限定在原俄罗斯帝国边界内,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具有共同文化—历史特征的地理区域。而杜金对于俄罗斯应有地缘政治形态的理解,不仅远远超出了俄帝国与前苏联的边境,甚至将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东北、西藏与新疆,蒙古,阿富汗甚至土耳其在内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统统都纳入其中,这远远超出了历史上欧亚主义者的论述。杜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办的《要素》杂志中曾描述了一个领土从都柏林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盛大的“欧亚帝国”。^② 这种领土扩张的地缘政治目标之一,正如日里基诺夫斯基所生动表达的,“要到达印度洋的海岸”。^③ 如果久加诺夫对俄罗斯未来地缘政治形态的理解使用一种复古的苏联视野(即满足前苏联边界范围内的地理空间)的话,那么,杜金等人则得出了俄罗斯整合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控制世界上最为有利的地理平台”的结论。杜金的相关论述及其所绘制的这些具有高度挑衅性的示意图,露骨地体现出其狂妄的扩张野心。

杜金与欧亚主义存在的又一大区别,在于他对欧亚主义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俄罗斯在融合了亚洲文化后所呈现的独特文明特征)的基本忽视,而这一向被认为是欧亚主义最基本的表述方式。相反,他的地缘政治观点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生硬的、冰冷的表述风格,完全破坏了欧亚主义借用文化手段在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俄境内其他民族文化之间所构建出的微妙平衡。但同时,不能将杜金的观点归结为纯粹的地理决定论,因为他从不掩饰其极端的俄罗斯民

① Marlène Laruelle,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Eurasianism: An Imperial Vers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p. 130.

②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09.

③ Marlène Laruelle, "Aleksandr Dugin: A Russian Version of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Kennan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294*, 1999, p. 7.

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立场。在他看来,俄罗斯的民族认同不应当来源于传统欧亚主义所断言的“斯拉夫—鞑靼”传统,而应当来源于“北欧—雅利安”传统,这种传统正是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范围内生存发展所具有的优越性所在。杜金在这方面的论述与纳粹当年的言论惊人地类似,杜金本人也从不否认他对纳粹主义的向往。^① 因此,可以将杜金的观点视为1933年后融合了纳粹“种族优越论”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俄罗斯翻版,他不过是借用欧亚主义与地缘政治研究的外壳装饰其极端激进的种族主义与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而已。

总的来看,杜金的观点实际上是将一些经典的地缘政治表述与俄罗斯部分思想传统进行生硬嫁接的结果,实质上存在许多问题。在概念与逻辑方面,“欧亚”时而被认为是俄罗斯,时而被认为是欧亚大陆,并且还不时与“心脏地带”混用,体现出概念与逻辑上的极大混乱。杜金似乎也乐于刻意模糊这些概念,以便更好地为其论点服务。^② 他的理论依据与提出的政策建议,要么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么早已被历史所唾弃。杜金有关建立以俄罗斯为首的反西方“大陆国家联盟”、从而重新培育出一个世界权势中心的观点,更是完全不着边际。在他所规划的这个反西方大陆同盟当中,有两个(德国与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国和公认的西方社会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同盟中除俄罗斯外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陆权国家。然而,这些充斥着逻辑和概念混乱的观点,却在冷战后俄罗斯社会大行其道,获得了很多极右翼政党与拥护者的支持,其部分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当代俄罗斯公共政策与对外战略辩论的中心位置。

四、置疑心脏地带、挑战欧亚主义

在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当中,欧亚主义与“心脏地带”等经典地缘政治观点被广泛接受,对前两者的现实价值及其可能的可能意义的探讨,成为后苏联时代俄地缘政治研究的基本线索。但同时,在冷战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些置疑和反对上述两大思想传统的声音。部分俄罗斯学者在批判欧亚主义与“心脏地带”理论的基础上,力求以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视角对俄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发展战略进行思考。虽然这部分学者的观点在影响力方面,远不及久加诺夫、杜金等政治人物与公共活动家的相关论述,在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亦相当有限,但这些学者在俄罗斯领土认同、国家建构、文化符号、对外政策等问题的探讨,可以为全面认识俄当代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① Marlène Laruelle,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Eurasianism: An Imperial Vers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p. 131.

^②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07.

持批判态度的学者首先力图打破将麦金德“心脏地带”以及“欧亚”概念与俄罗斯历史地理形态相等同的做法。瓦迪姆·辛别斯基(Vadim Tsymburskii)指出,麦金德在1904年和1919年划定的“心脏地带”,在范围并没有对应俄罗斯真正的历史—地理空间。在历史上,俄罗斯实际上具有四种不同的政治领土形态:即中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18—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但所有这些政治形态的领土轮廓都与“心脏地带”不相吻合。辛别斯基指出,麦金德关于“心脏地带”的构想由一片由沙漠、草原和森林所环绕的、位于欧亚内陆深处的大片区域,但这片区域并不包括欧亚大陆西北部由针叶林与落叶林构成的“辽阔的森林地带”,而这个区域正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要区域。辛别斯基据此认为,确认俄罗斯民族与领土身份的关键,在于判定那些真正支撑俄民族起源和生存发展的地理空间,“心脏地带”理论显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①不仅如此,这些学者认为,“欧亚”概念也同样无法解释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问题:尽管“欧亚”概念在提出之时基本符合苏维埃俄国的地缘政治现实,但后来的苏联在领土范围上逐步扩大,在意识形态上更不同于欧亚主义所构筑的文化认同。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地区在领土空间上的大幅变更,更拉大了“心脏地带”、“欧亚”等概念与当代俄罗斯在领土、文化上的裂痕。

正是意识到上述问题,这些学者开始寻求一种文化地理而非自然地理方面的解释,以重建俄罗斯民众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辛别斯基发展出一种“民族文明平台”概念以取代“心脏地带”与“欧亚”的提法。他将这个概念定义为俄罗斯人征服、居住与开发的区域,即俄民族历史上和现今集中居住的领土。从地域上看,这个民族文明平台包括乌拉尔山以西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乌拉尔与西伯利亚。在辛别斯基看来,从文化角度考察,俄罗斯是一个与欧洲文明(即所谓的“罗马—日耳曼”文明)和亚洲诸文明平行发展的、独立的文明模式;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俄罗斯则是一个长期被周围文明所包围的岛屿(ostrov)。^②冷战结束后,这种文明模式开始受到其周围文明的强力渗透,因此,俄罗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应当是致力于在内部巩固并发展这个民族文明平台,而非谋求“心脏地带”霸权并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建帝国。

尽管在表述方式上与久加诺夫和杜金等人存在很大区别,并强调“心脏地带”、“欧亚”等概念对于当代俄罗斯的不适用性,但辛别斯基思想的基础还是主要来自于欧亚主义,其观点同样也建立在对俄罗斯文明排他性和独特性的理解上。对这种排他性和独特性的强调,在逻辑上必然导致这些学者对俄罗斯步入西方文

^①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13.

^② Ibid., p. 114.

明道路持有相当的保留态度。因此,这些学者所讨论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身份问题,还包括民族与文化身份问题。他们力图通过确定俄罗斯的地理历史领土等“客观事实”,为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定提供理论支持,从而帮助打破那种以迎合西方文明模式、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为目标的政策模式,从而实现俄罗斯的“再度复兴”。

真正对“心脏地带”等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思想方法提出颠覆性挑战的,当属以库马卢丁·加吉耶夫(Komaludin S. Gadzhiev)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在回顾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后认为,麦金德理论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价值观密不可分,代表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大英帝国政治精英的国际战略理念。例如,维护大英帝国政治边界之内的经济繁荣,而非与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保持紧密联系等“重商主义”观点,在麦金德理论逻辑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正是这种观点为20世纪初期一些国家(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和苏联)谋求经济上自给自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市场经济模式,麦金德理论的重商主义基础与当下被广泛接受的政治经济组织规范存在根本对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与此同时,这种由政治精英阐发,通过秘密外交与幕后操纵方式的战略理念,在当时就与大众政治广泛兴起的趋势相抵触,现在更是与时代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严重脱节。因此,麦金德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直言不讳的敌视,实际上代表着当时大英帝国一部分政治精英对于“那些支撑当代世界秩序的结构”的敌视与反对。^①

麦金德理论中的地理决定论倾向及一些主要结论,也受到了这些学者的质疑。加吉耶夫指出,对自然地理具有持续的战略关键性的假设,实质上是一种过于粗陋的物质决定论,并不能作为一个可信的地缘政治分析基础。麦金德关于陆海对抗的论断不仅与历史经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同盟)严重矛盾,也与技术发展不相符合。在麦金德做出其论断之时,飞机、电报等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形态。当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航空、太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是对麦金德有关海陆机动性的对比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并从根本上调整了中心与边缘、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关系。麦金德的预言——“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的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从未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吻合,更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位于北美和亚太地区的事实严重偏离。因此,麦金德那些陈旧的、古板的理论早已脱离了国际政治现实,任何力图借此来规范当今国际关系的努力,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

这些学者清醒地看到,地缘政治在当代俄罗斯公共政策辩论中所受到的热烈

^① Marlène Laruelle,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Eurasianism: An Imperial Vers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p. 129.

关注,特别是部分学者与政治人物所坚持的反西方立场及对特定地理区域实加控制的主张,实际上反映出很多俄罗斯人决心借助欧亚主义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等思想传统重建大国地位的迫切心态,而“对于‘心脏地带’理论不加批判地接受催生了一系列关于俄罗斯地缘政治身份的陈词滥调”。^① 这些思想与麦金德当年的论述一样,虽打着“科学”、“学术”的幌子,却服务于俄罗斯国内的集体心态、政治家的竞选野心与激进的社会舆论。在此类观念影响下,俄罗斯似乎无需付出特别努力,仅凭借其地理位置就注定能够恢复大国地位。但实际上,这种过于简单的地理决定论既忽视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日渐窘迫的地缘政治状况,同时也无助于审慎策划一种可行的、符合时代需要与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相反,它仅仅反映出当前很多俄罗斯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对20世纪的回忆与迷恋之中,并不符合今天的地缘政治现实与时代精神。如果当代俄罗斯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它必将在一个历史死胡同中继续停滞与衰落。

五、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兴起的背景、特点与影响

荷兰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海尔曼·乌斯滕(Herman Wusten)说得有理,“一般说来,如果地缘政治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日常政治辩论中的作用开始大幅增强,表明其国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权力地位或者正在面临极大危险,或者正处于急剧变动当中”。^② 地缘政治在冷战后俄罗斯的骤然兴起,其历史与社会背景正源于冷战结束前后俄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

作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传统的大国、强国,俄罗斯帝国及后来的苏联在近现代国际权势体系中一向占据显要地位。大致自女沙皇叶卡德琳娜二世时代开始,俄罗斯帝国便以其辽阔的疆域、庞大的军事力量、锲而不舍的扩张野心,不断引发欧洲各国的疑虑与敬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欧洲诸强普遍衰败的同时迅速上升为一流强国,它与美国的争夺对抗成为了战后近半个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表征。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这种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虽然是前加盟共和国中领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但与苏联相比,它失去了1/4的人口和一半的领土,它在高加索的疆界退回到19世纪,在中亚则退回到19世纪中叶,在西部甚至退回到1600年左右伊凡雷帝统治时期

① Mark Bassin and Konstantin E. Aksenov,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p. 113.

② Herman Van Der Wusten and Gertjan Dijkink, "German, British and French Geopolitics: The Enduring Differences," *Geopolitics*, Vol. 7, No. 3, 2002, p. 21.

的边界。^① 尤为令人瞩目的,当属俄罗斯初创时的经济贫弱和国力拮据。特别是在采取了经济“休克疗法”后,俄罗斯几乎处在了一个国家临近分裂、经济大幅衰退、国民普遍贫困、卫生保健与教育体系迅速恶化、基础设施崩溃的绝境当中。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防范、贬抑与挤压态势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从坚持推行北约东扩、插足高加索和中亚、武力打击南斯拉夫联盟,到强烈指责俄罗斯打击车臣叛乱武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政策态度远非如很多人当初一厢情愿的预期中那样友善。作为直接后果,俄罗斯在冷战后国际权势体系中的地位快速败落,超级大国地位荡然无存,除了苏联时期遗留下的庞大核武库尚能显示其往昔的国威外,俄罗斯几乎已经沦为当今国际权势体系中的二流国家。

正是上述情形的出现给普通俄罗斯人带来了异常苦涩的回忆,急剧加重了国内普通民众的危机感与对俄罗斯历史与未来的不确定感。至少从18世纪初开始,许多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国家至少能够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平起平坐,有能力在其漫长的领土边界外发挥影响。但冷战结束后国家实力的骤然下降、超级大国地位的基本丧失、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严重恶化,在极大地削弱了俄抵御各种风险挑战能力的同时,也在其国内激发出一种掺杂着懊恼、不安和怨恨的氛围。有调查显示,直至2003年,仍有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表示难以适应苏联解体给他们带来的异常痛苦的认同危机及俄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② 国际关系学者格雷汉姆·史密斯(Graham Smith)评论道,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骤然兴起,不应仅将其视为一种为政治与学术精英话语的历史回归,它反映出当代俄罗斯社会由于苏联家园崩溃、强权地位丧失所引发的集体心态的巨大变迁,“反映出90年代初期俄罗斯面临的巨大的系统性危机”。^③

总的来说,冷战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特别是对欧亚主义与“心脏地带”的再度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巩固俄罗斯独立之初相当不稳定的联邦国家、推动后苏联时代俄国内政治的整合进程、重塑俄境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同时它还有助于填补当代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巨大空白,抚慰俄普通民众因国内经济恶化、国外利益受损、国际地位大幅下降所导致的挫败感与失落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地缘政治在冷战后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与公共政策辩论中一经出现,便立即引起俄国内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与政治精英的注意,并迅速被视为一种“揭示了国际关系发展规律与不同文明演进动力的理论体系”,甚至成为了在艰难时局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② Vladimir Kolossov, “High and Low Geopolitics: Images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Eyes of Russian Citizens,” *Geopolitics*, Vol. 8, No. 1, 2003, pp. 132-133.

③ Graham Smith, “The Masks of Proteus: Russian, Geopolitical Shift and the New Eurasian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p. 481.

下,能够挽救俄国家命运、复兴俄民族精神的一种“爱国的科学”。^① 随着地缘政治在当代俄罗斯影响的不断扩大,俄罗斯的领土空间、地理位置、自然地貌,以及附着其上的、迥异于其他文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开始成为俄当代政治、学术精英与普通民众界定自我身份、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之一,成为当代俄罗斯人解读其父母之邦的历史与现状、理解俄罗斯独特文明演进轨迹、复兴俄传统精神“必不可少”的工具。

除少数例外,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传统方式的,它并没有突破20世纪上半叶经典地缘政治的思维逻辑,很多俄地缘政治研究者仍坚持认为,地形、位置等自然地理因素对社会和政治进程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他们大多依然力图通过对所谓“客观的”、“恒久不变”的地理环境的分析考察,寻找可兹提升国家实力地位、复兴民族精神的“科学法则”。这种地理决定论倾向,使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同历史上很多地缘政治理论一样,很难避免被贴上“伪科学”标签的命运。另外,一些学者在模仿“德国地缘政治学”基础上提出的明显蕴含霸权主义、沙文主义与扩张野心的论断,在完全脱离国际政治现状与时代精神同时,也削弱了理论的适用性与可信度。尽管如上所述,部分俄罗斯学者已经意识到,地缘政治实际上同其他任何社会和人文科学一样,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功能,不仅来自于那些所谓的“不变量”或“客观现实”,也来自于研究者自身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倾向。但这些明显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或“批判地缘政治学”^②思路的呼声,在俄国内的影响力远不及欧亚主义、“心脏地带”此类主流话语强大。对此,俄当代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齐甘科夫尖锐地指出,“当前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地缘政治理论,完全脱离了现代理论的发展”。^③

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在学科建构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总的学科标准和理论规范,在概念界定上至今还存在一定的混乱。俄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公共传媒与学术界都在频繁使用诸如“欧亚”、“心脏地带”、“空间”等地缘政治概念与论断,但很多人对于此类概念均缺乏明确的界定与说明。如上所述,甚至如当代俄罗斯最知名的地缘政治学者杜金也在有意无意地混淆一些概念,从而为其结论服务。另外,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方法论与逻辑基础也不够清晰和连贯。在很多地缘政治论述中,地理决定论与民族优越论、历史归纳与地理分析时常交替出现。甚至在同一篇地缘政治著作中,一些在方法论、认识论甚至

① Mrak Bass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1, No. 4, 1997, p. 563.

② 有关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介绍,参见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42—48页。

③ [俄]巴·阿·齐甘科夫:《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现状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第47页。

在重大观点上彼此矛盾的政治学、经济学、宗教与社会学命题,也被不时用作证实其主张的直接证据。^① 这些情况都对当代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地缘政治对冷战后俄罗斯国内社会影响颇深。在当代俄罗斯,很多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都相信地缘政治在保卫俄国家政权、巩固领土完整、维持国内稳定与确保全球地位方面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用久加诺夫的话说就是,“我们生活在地缘政治的时代,我们忽视它并非仅是个错误,而是一种犯罪”。^② 俄当代很多政界、军界人物或公共传媒从业者都乐于使用一些地缘政治概念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希望藉此引起公共舆论的注意。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者”,他们在介绍“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时表现得尤为积极,在俄国内社会发挥了显著的影响。^③ 例如,杜金就曾担任过多家地缘政治类杂志的编辑,还创建过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出版社,他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再版多次,他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被俄很多高等院校采纳为地缘政治课程课本。另外,杜金在俄政坛也异常活跃:他曾担任俄国家杜马保守议员的政治顾问,并于2002年发起了“欧亚运动”。他的地缘政治论述对久加诺夫、俄前总理普里马科夫与普京的思想观点都有所启发。^④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地缘政治对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制定发挥了广泛的影响。部分受到地缘政治的启发,叶利钦政府自1993年开始逐渐放弃了原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幻想,改而实行以俄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为重、反对美国霸权和单极意图的对外政策,力图藉此重新确立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俄此后采取的“既重视西方又重视东方”的所谓“双头鹰”政策、强调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稳定东欧等一系列对外政策措施,均体现出冷战后俄地缘政治思想中的一些立场与信条。杜金在评价这一时期的俄对外政策时曾表示,“普里马科夫的政策实际上正是‘欧亚主义’与‘心脏地带’的政策,即:在国内实行左翼的经济政策,在国外帮助阿拉伯国家、朝向东方、加强前苏联地区的一体化程度”。^⑤ 普京执政后,在对叶利钦外交进行调整、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上,实施重建俄大国地位、维持巩固独联体、坚决抵制北约东扩、重返中东、重视东亚的全方位的“双翼外交”战略。与此同

① [俄]Э. Г. 索洛维约夫:《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载[俄]А. П. 齐甘科夫、П. А. 齐甘科夫主编:《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冯玉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② Charles Clover,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p. 10.

③ Vladimir Kolossov and Rostislav Turovsky, “Russian Geopolitics at the Fin-de-siecle,” in Andrew H. Dawson and Rick Fawn, eds.,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Eastern Europe*, p. 143.

④ Marlène Laruelle,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Eurasianism: An Imperial Vers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p. 127.

⑤ Charles Clover,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p. 13.

时,普京还希望用一种强调文明独特性的“俄罗斯思想”来整合俄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助传统的欧亚主义以重塑俄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努力。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俄罗斯国内国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俄部分学者与政界人士在发掘欧亚主义思想传统、吸取“心脏地带”等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力图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为冷战后俄罗斯的生存发展寻找一个足以恢复俄大国荣誉、确保国家地位、实现民族复兴的可行战略。在他们的努力下,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在其后20年时间里快速兴起,体现出独特的理论特色与极强的政策针对性,在冷战后俄国内社会中广泛流行,成为当代很多俄罗斯人认识理解国际权势体系、分析俄地缘政治身份的基本手段之一,并在俄当代对外政策制定中产生着日益显著的影响。但公允而论,俄当代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在继承扬弃传统思想优长的同时,坚决抵制其中的沙文主义、强权政治与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在结合地理历史分析基础上,采取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与人文关怀,以更加平衡、更加成熟、更加符合时代特点的态度,分析理解世界总体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从而将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实现有机的统一。